

从新出简牍看西汉后期南京的农业经济

张梦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通过分析《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并参证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可以发现西汉后期堂邑县不论人口规模、户均人数,还是垦田面积及其占土地资源的比重,抑或平均亩产量,都达到了当时农业经济的较高水平。研究表明,汉代垦田存在应收田租垦田面积和实际征收田租垦田面积之分。前者即垦田总面积,后者则是去除免征田租垦田面积后的垦田数。据此可重新估算东海郡的平均亩产量至少在两石左右。此外,由堂邑县农业经济繁荣的事实,还可推论与其一江之隔的秣陵、江乘、湖熟和句容,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也应较高。西汉后期的六合和南京主城区在经济发展上已位于江淮地区的前列。

【关键词】堂邑;南京;农业经济;东海郡;西汉后期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6-0041-09

Research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Nanjing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from the Newly Unearthed Bamboo Slips

ZHANG Meng-han

(College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angyi Yuanshou 2nd Year Yao Ju Bu" and the reference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other unearthed documents, we can find that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angyi's population size, average number of household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land resources, and the average yield per Mu has reached the developed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t that time. It can be further discovered from the "Yao Ju Bu" that the land reclamation area receivable in the Han Dynas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nd reclamation area actually levied on rent. The former is the total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latter is the number of cultivated land after excluding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that does not need to pay tax. Based on this, the average yield per mu in Donghai County can be re-estimated. In addition, from the fact that Tangyi is economically developed,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Moling, Jiangcheng, Hushu and Jurong, which are separated by a river from Tangyi, should also have a relatively developed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main urban areas of Liuhe and Nanjing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were already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Jianghuai area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angyi; Nanjing; agricultural economy; Donghai County;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收稿日期] 2020-08-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汉三国简牍经济史料汇编与研究”(19ZDA196);江苏省社科基金文脉专项一般项目“江苏简牍史”(19WMB021)

[作者简介] 张梦晗(1988-),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

从传世文献来看,南京地区的经济崛起被定位在六朝时期。虽然有些考古资料证明,在秦汉时期南京的经济便有了长足发展,但通常来说,同苏北地区的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盐城,以及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相比,当时南京的经济发展仍较为落后^①。然而最新公布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以下简称《要具簿》)却推翻了这一传统认识,为正确评估西汉后期南京的农业经济水平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本文就此谈谈一些浅见。

一、《要具簿》释文及堂邑的早期记录

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山东青岛土山屯147号汉墓出土简牍11枚,包括6枚性质为上计文书的简牍,其中以M147:25-1的内容最为丰富。该简两面书写,每面分上下两栏,第一面及第二面上栏为《要具簿》,共三十八行^②。

为便于分析和行文,现将《要具簿》相关释文转引如下:

·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

城一舟(周)二里百廿五步,县东西百卅五里五十步,南北九十一里八十步。

户二万五千七,多前二百卅七。

口十三万二千一百四其三百卅奴婢,少前千六百八。

复口三万三千九十四。

定事口九万九千一十,少前五百卅四。

凡算(算)六万八千五百六十八,其千七百七十九奴婢。

复除罢瘡(瘡)算(算)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五。

定事算(算)四万四千三多前六百廿二。

凡卒二万一千六百廿九,多前五十一。

罢瘡晚老卒二千九十五。

见甲卒万九千五百卅四。

卒复除繇(徭)使千四百卅一。

定更卒万七千三百八十三。

一月更卒千四百卅六。

库兵小大廿七万三千三百六十七,其廿三万七千一百卅三完,三万二千五十一伤可缮。

提封三万五千五百六顷廿七亩。

其七千七百九十八顷六十六亩邑居,不可垦(垦)。

八千一百廿四顷卅二亩奇卅二步群居,不可垦(垦)。

千七百卅九顷卅亩奇廿步县官波湖溪十三区。

① 按:关于秦汉时期江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成果,可参看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朱宏斌:《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19-151页;刘雷:《汉代苏北经济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陈饶:《江淮东部城镇历史发展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0-55页。

②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可𧇵(垦)不𧇵(垦)田六千𧇵顷九十八亩奇六十八步。

𧇵(垦)田万一千七百七十五顷𧇵一亩。

它作务田廿三顷九十六亩。

凡𧇵(垦)田万一千七百九十九顷𧇵七亩半。

其七千一百九十一顷六十亩,租六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石八斗二升。蓄害。

定当收田四千六百七顷七十亩,租三万六千七百廿三石七升。

百四顷五十亩,租七百𧇵一石五升。园田。

民种宿麦七千四百二顷五十九亩,多前百顷。

所收事它郡国民户百廿一,口二百五十一,卒𧇵。

一岁市租钱三百七十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八。

湖池税鱼一岁得钱廿九万九千九百廿三。

昆(鰥)寡孤独高年九百𧇵九人,昆(鰥)𧇵六人,寡三百八十三人,孤百七十六人,独百六人,高年二百廿八人。

一岁诸当食者用谷七万一千八百六十七石三斗六升。

吏员百一十三人。

三老官属员五十三人。

楼船士四百一十四人。

库工七十人。

民放流不知区处户千𧇵,口三千二百八十八,算二千七百一十,卒八百廿人。

以春令贷贫民户五千九十一,口万二千七百九十九。(M147:25-1 正)^①

由牍文可知,《要具簿》的记录涉及西汉后期堂邑县的地理范围、县城周长、户口、垦田、赋税、徭役、官吏和士兵等多项统计,实为县级上计文书的必备内容。“堂邑”,又称为“棠邑”,汉时其属地在今南京市六合区,位于江北地区。“元寿”乃西汉哀帝刘欣之年号,元寿二年即公元前1年。据《汉书·平帝纪》载,哀帝于是年六月病逝。此后因哀帝无子,在太皇太后和大司马王莽的主持下,由其堂弟中山王刘衍于九月继位,史称汉平帝。

堂邑的始置年代今已不详。据《左传》记载,棠邑是春秋时期吴楚边界的军事重镇,两国的交战常在这一带进行。如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楚国欲攻打吴国,就曾在棠邑屯兵。“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②棠邑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见于史载的南京地区城邑。《左传》中还有关于棠君的内容:“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杜预注曰:“棠君,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③王先谦《汉书补注》:“棠堂古通,后属吴。”^④《史记·刺客列传》:“专诸者,吴堂邑人也。”^⑤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应是最早见于正史的南京本土名人。至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年),勾践灭吴,越国尽有吴国故地,棠邑此时当为越国所有。楚灭越后,棠邑复为楚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棠邑地区设置堂邑县,隶属东海郡。秦汉

①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② 《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十四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58页。

③ 《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2090页。

④ [清]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9页。

⑤ 《史记》卷86《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16页。

鼎革后,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封陈婴为堂邑侯,堂邑县由此改为侯国。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继承堂邑侯的陈季须“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①。陈季须因在为母服丧期间做出违背人伦纲常之事,且兄弟争财而获罪自杀,堂邑侯国也被废除,恢复为县。西汉时堂邑县隶属临淮郡,东汉则隶属广陵郡。

二、西汉末年堂邑县的地理范围与人口

由《要县簿》可见,堂邑县“城一舟(周)二里百廿五步,县东西百卅五里五十步,南北九十一里八十步”。根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秦汉时期一里的长度为417.53米^②。照此折算,堂邑城的周长为1009米;全县东西最大距离为56.4千米,南北最大距离约为38千米,总面积或在1000平方千米以上。县城面积不大,但辖区的地理范围却颇为可观^③。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的公开资料显示,其“辖区东西最大距离46.9千米,南北最大距离50.8千米,总面积1471平方千米”^④。可以说,西汉堂邑县的辖区面积与今南京六合区相仿。

劳动力繁衍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元寿二年,堂邑县的户口多达“户二万五千七,多前二百卅七”、“口十三万二千一百四,其三百卅奴婢,少前千六百八”,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县。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谓堂邑侯国始封“千八百户”^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则记录为“六百户”^⑥。即便按《史记》的1800户计算,从汉初到元寿二年的大约200年时间里,堂邑的户口也显著地增长到了原有户口的13.89倍,达到25007户,遑论按《汉书》始封600户计算的41.68倍。另一个可以观察的视角是横向对比。堂邑的户均人口高于5.28人($132104 \div 25007 \approx 5.283$),超过了北方地区通常所说的“五口之家”。西汉堂邑县属临淮郡,《汉书·地理志上》载:

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四。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取虑,淮浦,游水北入海。莽曰淮敬。盱眙,都尉治。莽曰武匡。朐犹,莽曰秉义。僮,莽曰成信。射阳,莽曰监淮亭。开阳,贛其,高山,睢陵,莽曰睢陆。盐渎,有铁官。淮阴,莽曰嘉信。淮陵,莽曰淮陆。下相,莽曰从德。富陵,莽曰櫟虏。东阳,播旌,莽曰著信。西平,莽曰永聚。高平,侯国。莽曰成丘。开陵,侯国。莽曰成乡。昌阳,侯国。广平,侯国。莽曰平宁。兰阳,侯国。莽曰建节。襄平,侯国。莽曰相平。海陵,有江海会祠。莽曰亭间。輿,莽曰美德。堂邑,有铁官。乐

① 《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37页。

② 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

③ 按:徐龙国先生依照城邑规模,将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邑分为中型、小型和特小型三种类型,其中已知的特小型城邑共31座,面积皆在25万平方米以下。前述堂邑县城周长约1009米,由此可以推知其面积在6万平方米左右。即便在特小型城邑当中,这种规模也属于中等偏下(参看氏著:《秦汉史城邑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6-139页)。尽管不能据此认为堂邑的县域比之其他县而言也较小,但至少从堂邑县城来看,其面积是明显偏小的。

④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六合区概况》, http://www.njlh.gov.cn:ip/v6.nanjing.gov.cn/lhgl/lhgk/201812/t20181224_1346673.html。

⑤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88页。

⑥ 《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538页。

陵。侯国^①。

《地理志》记录的是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据此可知,当时临淮郡下辖29个县和侯国,共有268283户、1237764口。若按29县平均,每县为9251户($268283 \div 29 \approx 9251.1$);而按户平均,每户则为4.61人($1237764 \div 268283 \approx 4.61$)。这两项平均数字都明显低于堂邑县的水平,再加上堂邑县的人口数占临淮郡的10.7%($132104 \div 1237764 \approx 0.107$),可见堂邑县在临淮郡应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东海郡与临淮郡相邻,是公认的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引入东海郡的县均户口、户均人口加以对比。先看传世文献对这一方面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上》:

东海郡,户三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七。县三十八:郯,兰陵,襄贲,下邳,良成,平曲,戚,朐,开阳,费,利成,海曲,兰祺,缯,南成,山乡,建乡,即丘,祝其,厚丘,临沂,容丘,东安,合乡,承,建阳,曲阳,司吾,于乡,平曲,都阳,阴平,郯乡,武阳,新阳,建陵,昌虑,都平^②。

根据“户三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七。县三十八”,可求得东海郡县均户口为每县9432户($358414 \div 38 \approx 9431.9$),户均人数为4.35人($1559357 \div 358414 \approx 4.35$)。这也明显低于堂邑县的总户数和户均人口数,尽管东海郡的户口统计很可能存在虚报问题^③。再看出土文献,如尹湾汉简《集簿》:

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墾,都官二。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

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卅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一正)^④

此簿年代一般认为在成帝晚期,距元寿二年10年左右,因而也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可能是侯国较多,抑或其他原因,《集簿》所载的县均户数更低,每县只有约7008户($266290 \div 38 \approx 7007.6$)。但户均人数较高,约5.25人($1397343 \div 266290 \approx 5.25$)。如果再扣除户均较低的“获流”户数($266290 - 11661$)和人口数($1397343 - 42752$),那么东海郡的户均人数就更高了,每户5.32人,充分反映了东海郡的经济发达程度。而堂邑县的户均5.28人则仅仅低了0.04,与东海郡亦可谓伯仲之间。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流民的入籍也是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由于地域辽阔,自然灾害频仍,加之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汉代农民的破产和流亡是个普遍现象。为了纾解民困,缓和社会矛盾,朝廷所标榜的一项“荒政”,就是允许破产流亡的农民到经济条件好的郡县谋生。如“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⑤;民“避水它郡国,在所冗食之”;“流民欲入关,辄籍内”^⑥,等等。因此,能否吸引流民,或吸引多少流民,通常都作为考核郡县业绩的上计内容,也可以作为参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前揭《集簿》便明确记载了全郡的“获流”户口,其中流民入籍11662户,约占全郡户数的4.4%,入籍42752人,占总人数的3.1%。无独有偶,《要具簿》在这方面也有相应记载,即“民放流不知区处户千卅,口三千二

①《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89-1590页。

②《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88页。

③ 参看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页。

④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第77页。

⑤《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72页。

⑥《汉书》卷10《成帝纪》,第311、318页。

百八十八”。据此计算,堂邑的流民入籍占全县户数的4.1%(1030÷25007)和总人数的2.5%(3288÷132104),比东海郡的“获流”略低。此亦证明堂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总之,西汉后期的堂邑是一个人口大县。它的人口总数和户均人数都相当高,可以和淮河以北传统的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相媲美。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国家普遍把人口数量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而人口众多即意味着堂邑的经济应处于当时的先进水平。

三、西汉末年堂邑的垦田面积与粮食亩产

除了人口数量,垦田面积和亩产量亦是中国古代衡量各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堂邑县也不例外,其垦田面积和亩产量均处于全国前列。

根据《要具簿》可知,堂邑的土地资源为“提封三万五千五百六顷廿七亩”,共计35506.27顷。按照秦汉土地资源的分类——不可垦田、可垦不垦田和垦田,“其七千七百九十八顷六十六亩邑居不可垦(垦)”“八千一百廿四顷卅二亩奇卅二步群居不可垦(垦)”“千七百卅九顷卅亩奇廿步县官波湖溪十三区”为不可垦田;“可垦(垦)不垦(垦)田六千卅顷九十八亩奇六十八步”;“垦(垦)田万一千七百七十五顷卅一亩”“它作务田廿三顷九十六亩”“凡垦(垦)田万一千七百九十九顷卅七亩半”,即11799.375顷。堂邑县的垦田面积占“提封田”(即全部土地资源)的比例高达近三分之一(11799.375÷35506.27≈33.2%)。这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是较为突出的。

先看传世文献,《汉书·地理志下》:

论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六顷^①。

据此可知,平帝时期的全国土地资源共有145136405顷。其中不可垦田为102528889顷,可垦不垦田为32290947顷,其余垦田为10316569顷,定收田租的“定垦田”为8270536顷。按10316569÷145136405计算,全国垦田平均占土地资源的比例为7.1%。而堂邑县为33.2%,可见其土地利用率之高和垦田面积之大。

再看出土文献,如《都乡七年垦田租簿》:

凡垦田六十顷二亩,租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七升半。

出田十三顷四十五亩半,租百八十四石七斗,临湘蛮夷归义民田不出租。

出田二顷六十一亩半,租卅三石八斗六升,乐人婴给事柱下以命令田不出租。

凡出田十六顷七亩,租二百一十八石五斗六升。

定入田【卅】三顷九十五亩,租五百七十八石一【升】半。

【提封】四万一千九百七十六顷【十】亩百七十二步。

其八百一十三顷卅九亩二百二步,可垦不垦。

^①《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39-1640页。按:其中“可垦不可垦”当为“可垦不垦”,后一个“可”字衍。

四万一千一百二顷六十八亩二百一十步，群不可垦^①。

此簿的年代一般认为在武帝前期，是长沙国临湘县都乡某年的田租簿。其中提封田为41976.103顷，垦田为60.02顷，仅占全乡土地资源的0.143%。当然，长沙国是西汉中期经济比较落后地区，被称为“卑溼贫国”^②。当地人口较少，土地未得到大量开垦，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仍以东海郡来作为对比，《集簿》对东海郡土地资源的统计是：

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一正)

□国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万百卅二……卅五(?)万九千六……(一反)^③

纵然牍中对“垦田”或“定垦田”的记载已经难以辨识，但是由于“提封田”分为“群不可垦”、“可垦不垦”和“垦田”或“定垦田”三种类型，在已知“群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面积的情况下，可通过“提封田”减去“群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求得“垦田”的面积^④。其整数算式如下： $512092 - 211652 - 190132 = 110308$ (顷)。东海郡的这一垦田面积，约占全郡土地资源的21.54%，远高于全国7.1%的平均水平。若排除一些垦田面积占比较低的县邑侯国，有些县的垦田面积或能占到全县土地资源的30%左右。这与堂邑县的垦田占比33.2%大致相同，也更加证明了堂邑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高。

堂邑县的平均亩产量也很高。根据《要具簿》可知，堂邑在元寿二年的总垦田数为1179937.5亩——“凡猥(垦)田万一千七百九十九顷卅七亩半”，其中受灾而免收田租的垦田数是719160亩，免收田租数是6195382石——“其七千一百九十一顷六十亩，租六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石八斗二升。菑害”，最终定收田租的垦田数是460770亩，实际征收田租数是3672307石——“定当收田四千六百七顷七十亩，租三万六千七百廿三石七升”。除去四舍五入等误差，堂邑县因灾害而减免的田租平均每亩为8.61升($6195382 \div 719160 \approx 8.61$)，而定收垦田的田租则平均为7.97升($3672307 \div 460770 \approx 7.97$)，合计田租平均每亩为8.36升($9867689 \div 1179900 \approx 8.36$)。根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⑤景帝以后，汉代基本上都采用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税率。按三十税一算，堂邑因受灾而免租的垦田的平均亩产量为2.58石(8.61×30)，定收垦田的平均亩产量为2.39(7.97×30)石，而合计垦田的平均亩产量为2.5石(8.36×30)。即便以每亩2.39石为准，这个平均产量也已非常得高，意味着少数高产田的亩产量在3石至4石之间，甚或更高，更不要说每亩2.58石了。尽管汉代存在上计造假现象，我们对《要具簿》的记录不可尽信，如宣帝便斥责郡国“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⑥。但即便是其中存在较大水分，堂邑的亩产量也比很多地区要高，这一点应当没有疑义。

值得一提的是，《要具簿》还为厘清汉代垦田计算和亩产量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如

① 马代忠：《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北京：中西书局，2013年，第213—214页。今据朱德贵《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及其相关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高智敏《秦及西汉前期的垦田统计与田租征收——以垦田租簿为中心的考察》（邹文玲主编：《简帛研究》2017春夏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60页）对简文有所校改，即其中加“【】”部分。

② 《史记》卷59《五宗世家》，第2100页。

③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第77—78页。

④ 参看晋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⑤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1135页。

⑥ 《汉书》卷8《宣帝纪》，第273页。

前所述,《地理志》仅仅记载了全国“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六顷”的数据,比“提封田”的“总数少2046033顷”^①。以往对这一误差众说纷纭,现在看来,汉代垦田实则存在应收田租垦田面积和实际征收田租垦田面积之分。应收田租的垦田面积就是全国、全郡、全县和全乡的垦田总面积,而实际征收田租的垦田面积,即“定垦田”,则是去除免征田租垦田面积后的垦田数。由于汉代有灾害、官爵、归义等免租规定,如《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出田十三顷四十五亩半,租百八十四石七斗,临湘蛮夷归义民田不出租”“出田二顷六十一亩半,租卅三石八斗六升,乐人婴给事柱下以命令田不出租”,《要具簿》“其七千一百九十一顷六十亩,租六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石八斗二升。菑害”,因而“定垦田”面积与总垦田面积有很大一部分差额。《地理志》中,免征田租的垦田数占全国总垦田数的19.83%(2046033÷10316564)。而《都乡七年垦田租簿》所载免征田租的垦田数,则占全乡总垦田数的26.77%(16.07÷60.02)。至于《要具簿》,所载堂邑免征田租的垦田数更高达全县总垦田数的61%(7191.6÷11790)。因而可以推测:《汉书·地理志下》的记录采取的是排除法,即记录提封田数后,再减去不可垦田、可垦不垦田和定垦田面积后,剩余的垦田面积即为免征田租的垦田数。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不可垦田、可垦不垦田和定垦田的面积之和会与提封田的总数产生出入。据此还可重新估算东海郡的平均亩产量。以往不了解汉代“垦田”数为应征田租的垦田面积,并非实际征收田租的垦田面积,有些学者便低估了东海郡的亩产量,认为“平均每亩田租约为3升,以三十税一计之,亩产也就是八九斗”^②。其实不然。用《集簿》的田租总额——“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升”(一反)除以总垦田数之前,一定要首先减去免征田租的垦田面积,求得“定垦田”的总面积。尽管《集簿》这部分的记载漫漶,既不能看出免租的垦田数,也不能看出“定垦田”数,但根据《地理志》和相关简牍,我们仍可大致估算出东海郡的“定垦田”数。取整数计,按《地理志》全国平均免征田租垦田占比20%算,东海郡的定垦田数为88246.4顷(110308×0.8),每亩田租平均为5.74升,平均亩产在1.72石以上。考虑到东海郡是秦汉时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这一估算明显偏低。再按都乡免征田租垦田占比27%算,东海郡的定垦田数为80524.84顷(110308×0.73),每亩田租平均为6.29升,平均亩产1.9石。若按《要具簿》的占比约60%算,则东海郡的定垦田数为44123.2顷(110308×0.4),每亩田租平均为1.15斗,平均亩产为3.44石。这一估算又显得过高,仅作为一种参考。但总的来说,东海郡的平均亩产至少在两石左右应是可信的。另外还要看到,当时东海郡的主要农作物是冬小麦,“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顷,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一反),约占总垦田数97%以上。而《要具簿》记载堂邑元寿二年“民种宿麦七千四百二顷五十九亩,多前百顷”,仅占其总垦田数约62.8%。从小麦的亩产量来说,能达到平均亩产两石左右已经相当之高,完全可以和堂邑的混合亩产平均2.5石相比。

四、余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人口规模、户均人数,还是垦田面积及其占比,抑或平均亩产,西汉后期的堂邑县均达到了当时农业经济的较高水平。加之《地理志》记载堂邑设有铁官^③,《要具簿》记载“一岁市租钱三百七十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八”,堂邑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应该较为发达。这就充分

① 彭卫:《关于小麦在汉代推广的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杨际平:《再谈汉代的亩制、亩产——与吴慧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③ 按:陈大海先生认为,南京六合走马岭汉代遗址即可能是一处与冶铸有关的大型聚落。参看氏著:《六合走马岭汉代遗址考古勘探收获及初步认识》,载南京市博物馆著:《学耕文获集——南京市博物馆论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6-159页。

证明堂邑的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与之相关的是,如何看待长江以南的秣陵、江乘、湖熟和句容的经济发展水平?

据《汉书·地理志》可知,西汉时期秣陵、江乘、湖熟和句容,即今天南京的主城区和镇江的部分地区,均隶属于丹阳郡。一般认为,虽然湖熟文化的起源较早,在南京主城区也有一些秦汉的考古发现^①,但上述地区在秦汉时期总体相对落后。其中一个主要参照,就是秦汉时期苏南地区的苏州(吴)、无锡、常州(毗陵)的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高。比如“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②。不过,这一判断是建立在淮河下游以南的江北地区通常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在《要具簿》已从各个角度证明西汉堂邑县的农业经济实际相当繁荣的情况下,继续把秣陵、江乘、湖熟和句容等地区视作经济发展的洼地,恐怕并不妥当。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前提下,一江之隔的堂邑欣欣向荣,相距不远的苏南地区发展也很蓬勃,唯独处于中间地带的秣陵、江乘、湖熟、句容却严重落后,这很难自圆其说,难以找到可靠的史料支撑。因而可以推论,至少在西汉后期,秣陵、江乘、湖熟和句容的农业经济也都已比较发达,只不过同堂邑相比还略有差距而已。也就是说,除了没有设置郡治,西汉后期的六合及其毗邻的现今南京城区范围在经济发展上已位于江淮地区的前列。这应是后来三国鼎立之际,孙吴把都城定在秣陵并改名建业的重要原因。

(附记: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参 考 文 献]

- [1]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 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J]. 考古学报, 2019, (3).
- [2]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 尹湾汉墓简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3] 马代忠.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C]//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 北京: 中西书局, 2013.
- [4] 彭卫. 关于小麦在汉代推广的再探讨[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 (4).
- [5] 晋文.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
- [6] 陈大海. 六合走马岭汉代遗址考古勘探收获及初步认识[C]// 南京市博物馆. 学耕文获集——南京市博物馆论文选.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7] 王志高. 秦汉秣陵县治新考[J]. 学海, 2014, (5).

^① 王志高:《秦汉秣陵县治新考》,《学海》2014年第5期。

^②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68页。